

安徽文艺出版社

传统与中国人

林岗／著



传统与中国人

刘再复 林 岗 著

责任编辑:徐海燕 江奇勇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10,000

印数:5000

版次: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73-X/1·1653

定价:21.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次

第一章 导论：“五四”文化革命与人的设计

- 第一节 时代的逼迫：中华自我认识的开始…………… 7
- 第二节 论争的归结：父辈文化应受审判…………… 10
- 第三节 独特的思路：非文艺复兴运动…………… 18
- 第四节 反省的弱点：启蒙性思索的短促…………… 29
- 第五节 当代新儒学的迷失：传统理想主义…………… 35

第二章 批判理性的成长

- 第一节 明末清初时期…………… 41
- 第二节 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时期…………… 55
- 第三节 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 65
- 第四节 结语…………… 77

第三章 礼治秩序与主奴根性

- 第一节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运动对人的
不同认识…………… 87
- 第二节 “吃人”筵席的发现…………… 98
- 第三节 “文化的突破”(一)…………… 112
- 第四节 “文化的突破”(二)…………… 139
- 第五节 礼治秩序与个人…………… 152
- 第六节 失去个性的扭曲…………… 175

第四章 寻求解脱的代价

目

次





第一节	生的悲哀·····	189
第二节	有限与无限·····	201
第三节	通往无限的歧途·····	219
第四节	痛苦的意义·····	250

第五章 道德的阴影

第一节	“生存技巧”:冷漠、自私、虚伪·····	263
第二节	道德的困境·····	275
第三节	道德 法律 血缘 人道·····	302

第六章 天朝心态

第一节	对西方文化的反应:五次论争·····	325
第二节	天下模型与世界帝国·····	354

第七章 附论:鲁迅与中外文化

第一节	对传统文化的逆向思维·····	376
第二节	未完成的课题:寻找传统转化的机制·····	383
第三节	开辟文学研究的文化视角·····	387

附 录	漫议转化传统的关键·····	393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设计·····	407

后 记

初版后记·····	刘再复 / 423
再版后记·····	林 岗 / 424
《传统与中国人》再版后记·····	刘再复 / 427



第一章

导论：“五四”文化 革命与人的设计

- 内容提要**
- 1 • 鸦片战争失败后对文化传统进行根本性反省的原因：西方冲击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参照系；空前的失败严重地挫伤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
 - 2 • 近代关于自立之本和自强之道的争论。结论：几千年一贯制的乾坤应当转动，父辈文化应当受到审判。
 - 3 •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独特的文化革命。它既区别于在此以前的古代思想家们的思路，也区别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思路，它是中国文化史上伟大的质变点。
 - 4 • 新文化运动在对国民性病态的反省中表现出来的弱点：过重的自虐心理；建设的实绩不够丰厚；缺乏现代经典意识；“先锋派”的味道；启蒙性的形而上思考过于短促。
 - 5 • 对当代新儒学的简要评论。两种迷失：全盘西化；传统理想主义。



第一节 时代的逼迫：中华自我认识的开始

我们原来计划共同著写一部《近代中国自我认识史》，但是，进入研究之后，才充分意识到工程的繁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选择“五四”时期这个断面，带评论性地展示这个时期文化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兼顾这之前近代思想家们的见解，然后渗入我们的批评。我们先以这部论述性的著作，与读者们作一次思想的交流，至于作“史”的愿望，只好留待以后了。

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在这之前，我国尚没有科学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史。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的民族才开始逐步结束自我陶醉的盲目状态，开始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落后面和黑暗面，而认真地反省并形成认识自己的自觉历史运动。

一个民族，要认识自己是很不容易的，而要认识自己的弱点和反省自己的黑暗面就更不容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的古文明系统的民族，那就加倍地艰难。如果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巨大地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鸦片战争



对于我国的确是一种地震，在这次战争中，我国是正义者，但又是失败者。巨大的失败，从根本上伤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并迫使我们的民族不得不考虑失败的原因。但是，思考失败的原因并不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反省，更不意味着对自己的民族性弱点会进行全面的理性的批判和认识。那么，为什么鸦片战争之后，会导致我们的民族的自省和理性批判呢？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1)鸦片战争一方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另一方面又给中华民族带来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参照系。

在鸦片战争之前，世界中心意识还占据着我们民族的头脑。因此，我国还不可能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在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问题上，日本比我们谦虚。他们对待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中空”感觉，即觉得他们的文化是由中国传入，因此没有那么强烈的自大情绪，也没有那么沉重的负担，而善于摹仿和学习异族的先进文化。但我国对于自己则有一种“中心”感觉，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在利马窦给明朝皇帝献出世界地图之前，我国当时还不知道地球有东半球和西半球，那时，我们的地图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认定世界只是一个中国和它周围的一些弹丸小国。直到清末，一些朝廷皇臣对世界还是一无所知。鲁迅先生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讽刺当时的一些官僚：“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①清末的大学士、义和团的幕后发动者徐桐竟“连算术也斥之为洋鬼子的学问”，鲁迅说“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家，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 314 至 31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①总之，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因此，我们的民族并不了解世界，因此，也就没有一个可以观照自己的世界性的参照系统。

鸦片战争之后，炮火惊醒了一部分开明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张开眼睛看世界。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参照系统开始若明若暗地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获得这个参照系统等于具备了自我观照的时代镜子，也就是获得了自我观照的文化条件。具备了这种条件，中华民族就在新的层面上开始认识自己。由于自己是被西方列强打败的，因此，我们民族的眼睛开始注意的是西方。而对于只有一水之隔的近邻日本并未注意。1868年的明治维新并没有惊动正在烦恼中的中华民族。当时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徐继畲所著的《瀛环志略》等研究世界地理的名著，还以为日本只是由长崎、萨峒马（萨摩）、对马三岛所组成的国家。直到1874年，日本军队武装侵略我国台湾，清廷朝野才引为震惊，从此才开始注意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尽管他们开始只把明治维新看成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不予肯定，但最终他们还是认识到这次维新的不平常的意义，包括洋务派李鸿章也不得不赞赏。这样，中华民族又从东方获得了另一个自我认识的参照系。多一个参照系，就多一个面对自己、认识自己的镜子。由于有了西方列强和近邻日本作为镜子，我国的自我形象就显示得很清楚，我们民族终于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这种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开始只认识到自己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又认识到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参照过程，是一种正视世界、正视自己的过程，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过程。它必须克服自身巨大的心理障碍，因此，参照过程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314至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是一个很艰难又很痛苦的过程(关于认识历程,第二章中将有评述)。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恰恰是找到民族的痛苦点。当时的文化先驱者,作为我们民族的先进文化代表,他们正视和承受这种痛苦,并勇敢地面对自己曾经陶醉过的文化建筑,进行一次全面的自我审判,以谋求超越自身,以争取自己的父母之邦成为自立于世界的崭新的强大存在物。总之,鸦片战争之后,在一个巨大的镜子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已发现:中国并不是强国,自己并不是位居世界中心的“中央大国”。(发现自己不是强国,这是我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个重大发现)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应当摒弃世界中心意识,应当面对自己民族的弱点进行反省,应当正视自己已经落后,应当改造自身,自强自救,以免被世界所淘汰。因此,民族意识随着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挫折反而高扬起来了。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认为: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义。(参见《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一概括是正确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不再带着“中央大国”的心理去争取万国来朝,而是回缩到本民族的范围内,争取本民族在世界竞争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思维的基点,已从世界转向民族。

(2)鸦片战争的失败空前地损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挫伤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我们民族的一次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为了求得民族心理上的平衡,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重新认识。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的文化心理以巨大的冲击。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关系,唯一重要的事件是佛教文化的传入。但是,中国文化对佛教文化的接受是以和平的方式加以接受的,并且,在和平接受之后,又以自己强大的文化传统把它同化了,或者说中国化了。因此,佛教

尽管在中国流行,甚至形成很大的文化势力,但中国本位文化仍然保持强大的优势,更确切地说,是仍然保持着文化心理优势。总之,本位文化仍然是主导型的文化,对于本位文化的优越感仍然毫无动摇。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包括枪炮战舰在内的西方文化,却给中国文化带来空前巨大的冲击。这是佛教文化无法比拟的。中国不可能再以和平的方式和欣然的情感接受西方文化,而且,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国土之后,中国本位文化也很难给予同化,这种文化上的被动状况,加上政治、经济方面的失败,便产生了文化心理的巨大倾斜。这样,中国文化便发生了一次深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自卑感和落后感产生了。为了使民族文化心理获得平衡,为了重新寻找本位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主导位置,中国知识分子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反省。这是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反省。

尽管近代中国文化心理发生巨大转变,唯我独尊的意识和盲目的优越感瓦解了,尽管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本位文化的弱点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但是,反思的开始阶段(直至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反思),仍然是一种顺向性的反思,即仍然是企图在自身的文化体系中克服缺陷,以谋求传统文化体系在现代世界环境中的自我完善。正是这种反思的基本性质,导致改良派人物梁启超最终无法接受“五四”文化思潮。“五四”文化思潮是更深刻、更彻底的革命思潮,它完成了我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二个最重大的发现,即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他们发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改革人的精神素质,疗治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当成“人”,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五四”运动对国民性的反省,超越了鸦片战争以来反省的抽象性,开始对国民性的



劣根性进行具体地揭露和展示，而且是用现代“人”的标准和尺度来揭示国民性的弱点，迫使我们的民族不得不在价值观念方面和国民性格方面进行全面的更新。

(3)由于鸦片战争与甲午战争的失败，我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因此，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把文化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导致了文化上以反省民族性弱点为思维中心的忧国思潮。

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的各阶层以震撼性的巨大刺激，而1895年的甲午战争的失败，则在更大的程度上，伤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在这场战争中，庞大的中国不是被西方“列强”所打败，而是被我们向来并不放在眼里的“蕞尔”小国——日本所打败，这是极大的民族屈辱。而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来的是更大的民族屈辱：清政府竟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等大片领土，并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银子。这一民族的奇耻大辱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特别是在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心中，更是引起极大的悲愤和忧思。《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便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目击国耻，忧思愤盈”（上清帝第四书），甚至感到自己“有靦面目，安能与共此大字”（《中日和约之后》）。这之后，他和梁启超鼓动了广东、湖南的举人上书，紧接着又联合各省公车一千三百余人上折要求拒绝和议，呼吁光绪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维新运动。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忧愤情绪，正像谭嗣同的诗歌所写的：“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

① 《谭嗣同全集》488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



这些忧国者是深刻的爱国者。他们的爱国特点与传统的爱国者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爱国不是表现在讴歌祖国的强大与美丽,而是含泪揭露国家的缺陷,即民族灵魂中的弱点,从而激起全民族奋起疗治的注意。这就是说,当时的爱国思潮主要是表现为忧国思潮。由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又进一步瓜分中国,民族灾难日益深重,因此这种带有时代性特征的爱国思潮进一步蔓延。当时带着国家将亡的深切忧思的知识分子“遍天下”,几乎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充满着忧国情怀。关于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爱国者,梁启超这样分析过:“有忧国者,有爱国者,爱国者语忧国者曰:汝昌为好言国民之所短,曰:吾惟忧之故。忧国者语爱国者曰:汝昌为好言国民之所长,曰:吾惟爱之故。忧国之言,使人作愤激之气,爱国之言,使人厉进取之心,此真所长也。忧国之言,使人堕颓放之志。爱国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短也。”^①又说:“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谁欤踊者,吾歌矣,谁欤和者。”^②他还指出,忧国也有真假之分,真正的忧国者,应当是自责自望的救国者。他说:“以忧国忧天下者也。如真忧之,则必无办事望人焉,以望诸己而已。必无办事责人焉,以责诸己而已。各有不可诿之责分,各有可得为之权限,愿我士大夫,皆称其责望人之心,以自望自责,则天下事之可为之。”^③在梁启超看来,真正要救国,要真正地分担民族的忧烦,就应当求诸自己,而不是责备他人。只有这种不推诿责任,而勇于自责自救的爱国者,才是具有忧国精神的切实的爱国者。

①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 39 至 40 页。

②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 40 页。

③ 《饮冰室文集》,卷二,28 页。



第二节 论争的归结：父 辈文化应受审判

自我认识并不是最后目的。自我认识是为了自我强大，自省是为了自强，自责是为了自立。那么，什么是自立之“本”和自强之道呢？关于这个问题，近代的知识精英一直在探求着，争论着。

维新派在“变法”失败之后，已朦胧地认识到这个“本”就是国民，这个“道”，就是国民品格的“更新”。梁启超的新民说，就是国民品格更新命题的系统性阐述。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很抽象的，特别是他们的更新之道，还是十分狭隘的。他们还企图在旧的文化体系中借助外来文化的某些力量以寻找更新之道，但这只是乌托邦式的文化幻想。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才真正地找到这个“本”。这个“本”，就是负载着文化的“人”。但不是旧文化体系所规范的那种意义的人，而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自强之道，就是迎接现代化的挑战而走上世界强国的道路，而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改造人的精神素质，重塑国民的灵魂，便是开启我们民族现代化大门的钥匙。这就是“五四”时期中国知



识分子找到的民族更新的突破点和生长点。

近代以来,知识精英中的“本”“末”之争,正是自强之道和自立之本逐步明确的过程。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把社会改革停留在器械、工艺的层面,他们实际上企图以“物”为自强的突破点和生长点。而改良派比他们前进一大步的有两个要点:一是把“物”推至“制度”的层面;二是注意到“人”的层面。因此,他们批评洋务派只注意治“标”,而不注意治“本”。维新派的救国逻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在这个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世界里,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只有靠自身的强大,而强大之道,一是要以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替封建的帝制,二是要改造国民精神,造就一代新民。因此,他们给国家强大所开的药方便是这著名的三味:“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①严复、梁启超以及早期的鲁迅,他们都认为只有把人变成“新民”,才是立国之本,救国之本。而那些主张把练兵、开矿、学习西方技术作为自强之道,乃是舍本求末。当时严复说:“此三者,自强之本也。不如是,则虽有伊尹、吕尚为之谋,吴起、李牧为之战,亦将浸衰浸灭,必无强之一日决也。虽然,无亦有其标者焉。然则治标奈何?练兵乎?筹饷乎?开矿乎?通铁道乎?兴商务乎?曰:是皆可为。有其本则皆立,无其本则皆废。”^②在严复看来,中国改革的关键显然在于国民本身。既然如此,改革中的立废,就应当以“本”为标准,有其本则立,无其本则废。也就是有利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者,就要立,否则就要废。梁启超也认为,只有民力、民德、民智综合而成的国民独具之特质,才是一个民族的“根柢”。按照梁启超的救国逻辑,那就是一个国家要有新

① 《严复集》第一册 27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② 《严复集》第一册 32 页,中华书局,1986 年版。



的面貌，关键在于“新民”，而要培育“新民”，关键又在于培育“新民”的独立的品格。关于这点，他反复地说。1899年，他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说：“凡一国之存亡，必由其国民之自存自亡，而非他国能存之能亡之也。苟其国民无自存之性质，虽无一毫之他力以亡之，犹将亡也。苟其国民有自存之性质，虽有万钧之他力以亡之，犹将存也。”^①同年，他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中又说：“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②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再次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具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③

严复、梁启超这种救国逻辑，后来被许多革命家、思想家所接受，包括早期的鲁迅，他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早期的论文中，在论述救国的道路时，也反复地说明，改革中国，切不可“舍本求末”，要抓住“根柢”，而他的“根柢”的含意，与严复、梁启超所说的“本”、“根柢”是相同的。他指的也是立国之道，首先在于立人，在于铸造国民新的特性。所以，他在《科学史教篇》中批评当时“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他担心举国上下只追求枝叶，则所谓“振兴实业”等等，而忘记寻求根本，即人的精神。而舍本逐末的国家则很快就会灭亡。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说：“欧美之强，莫不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之三，48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之三，55页。

③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册，6页。